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群体共同经历影响不公平感知

作者：吕飒飒，孙欣，沈林林，武雨晴，赵纾，王霏，汪祚军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本文通过三项实验，采用改编后的三人最后通牒博弈任务，考察“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对个体不公平感知的影响。研究结果对社会管理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但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需要与作者商榷：

意见 1：本文第一次提及 UG 任务时，前文并没有给出缩写的具体含义，只能凭借读者的判断认定为最后通牒博弈，如果要使用缩写的话，建议作者在第一次提及最后通牒博弈时，给出缩写，而不只是英文单词。

回应：感谢专家指出该问题，我们在修改稿中第一次出现最后通牒博弈任务时给出了英文及简称，如下(见修改稿“1 引言”部分第 2 段)：

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 简称 UG; Güth et al., 1982)和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 简称 DG; Kahneman et al., 1986)是用来考察不公平现象的经典研究范式。

意见 2：文章 1.2.1 部分提到“近年来，基于经济博弈……(Camerer & Thaler, 1995; Yamagishi et al., 2009)”。近年来的文献却引用 1995 年和 2009 年的文献，表述不合理。

回应：感谢专家指出该问题，我们在修改稿中替换了更近期的文献，修改后的语句如下(见修改稿“1.2.1 群体共同经历、社会比较与不公平感知”部分第 1 段)：

近年来，基于经济博弈任务的诸多研究已证明，个体并非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纯粹理性人，而是更在意自身与他人所获得的相对收益(e.g., Blake & McAuliffe, 2011; Blake et al., 2015; My et al., 2018; Zhen & Yu, 2016)。

意见 3：文章 1.2.2 部分第二段的“研究发现，当提议者为外群体成员时，……态度更加消极(王益文等, 2014; Dover et al., 2015; McAuliffe & Dunham, 2016)。”与其后的“例如，王益文等人(2014)通过最简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的接受率显著低于提议者为内群体成员的条件。”，两部分论述的为相同内容，建议进行重新组织论述。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为避免重复，我们将该部分的论述重新进行了组织，修改后的语句如下(见修改稿“1.2.2 群体成员身份与不公平感知”部分第 2 段)：

基于双人最后通牒博弈任务的一些研究表明，个体更倾向于拒绝外群体成员的不公平分配(王益文等, 2014; Dover et al., 2015; McAuliffe & Dunham, 2016; Valenzuela & Srivastava, 2012)。例如，王益文等人(2014)通过最简群体范式操纵内群体和外群体身份，随后让被试完成最后通牒博弈任务。结果表明，被试对外群体成员提出的不公平提议(无论是中等不公平提议，还是极端不公平提议)的接受率显著低于提议者为内群体成员的条件。

意见 4：关于研究假设 2：假设提出段落的前半部分提出“相对于外群体成员的不公平决策，个体对内群体成员的不公平决策的容忍度更高”，后半部分提出“这可能是由于歧视归因”。

针对前半部分的论述,在本文中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或个体独自经历不公平均不涉及这一不公平决策是由外群体成员还是内群体成员提出的影响,后半部分的歧视归因在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或个体独自经历不公平中都有可能存在,这一假设的提出并不充分。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的确,原稿在此处的论述逻辑不够紧密。具体而言,正如专家指出的“在本文中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或个体独自经历不公平均不涉及这一不公平决策是由外群体成员还是内群体成员提出的影响”,原稿中并未非常明确地将群体共同经历与有关内外群体成员身份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为此,我们在修改稿中对这一部分进行了重新梳理。

首先,修改稿增加了第三方惩罚相关的研究来进一步论述群体成员身份对不公平行为的影响,如下(见修改稿“1.2.2 群体成员身份与不公平感知”部分第3段):

当然,基于双人最后通牒博弈任务的另一些研究也发现了相反的结果,即为了维护公平的规范,人们更倾向于惩罚内群体成员的不公平行为,表现出“黑羊效应(black sheep effect)”(McLeish & Oxoby, 2011; Mendoza et al., 2014; Wu & Gao, 2018; 张振等, 2020)。然而,关于第三方惩罚(或称为利他性惩罚)的研究则相对一致地表明,人们更加难以容忍外群体成员对内群体成员实施的不公平行为。例如,Bernhard 等人(2006)以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当地的两个部落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当内群体成员遭受外群体成员的不公平对待时(相比外群体成员遭受外群体成员的不公平对待,以及外群体成员遭受内群体成员的不公平对待),两个部落中的居民都对不公平实施者施以更严厉的惩罚。Goette 等人(2006)以在一起进行为期四周集训的部队军官为研究对象,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即当自己所在排的军官受到另一个排的军官不公平对待时,被试对不公平实施者施加了更严厉的惩罚。Schiller 等人(2014)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不公平实施者无群体身份,当不公平实施者为外群体成员时,人们会实施更严厉的惩罚,而当不公平实施者是内群体成员时,人们会实施更少的惩罚。

其次,也是审稿专家非常关心的,即如何将内/外群体成员身份的研究与本研究的具体假设相联系,我们进一步梳理了假设2的提出逻辑,修改后的内容如下(见修改稿“1.2.2 群体成员身份与不公平感知”部分第4段):

总体而言,无论是关于双人最后通牒博弈的研究还是第三方惩罚的研究,其结果均表明,群体成员身份会影响个体的不公平感知与行为。尽管有部分基于双人博弈任务的研究表明,人们对内群体成员实施的不公平行为更加难以容忍,但其他研究,包括双人博弈任务以及第三方惩罚的研究,则表明人们会对外群体成员实施的不公平行为产生更强烈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具体到本研究中,当个体与他人以群体身份共同经历不公平时,个体可能将不公平实施者视作外群体成员(毕竟,内/外群体是相对而言的)。根据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Turner et al., 1987),人们会根据一些线索,甚至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线索,自动地将自己和他人划分为内群体或外群体。一旦个体将自身与共同经历者视作内群体成员,而将不公平实施者视作外群体成员,基于以往研究,我们似乎可以推论出一种可能,即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相比个体独自经历不公平,会提升个体的不公平感知(假设2)。

此外,专家之所以对“歧视归因”的问题感到困惑,可能同样是由于我们在原稿中对假设2的提出逻辑不够清晰明确。Dover 等人(2015)的研究发现,受外群体成员不公平对待时,相比受内群体成员的不公平对待,被试更有可能将这种不公平对待归因为“歧视”,从而产生更强烈的愤怒情绪,以及对不公平实施者的更严厉的惩罚。具体到本研究中,虽然的确有可能如专家所指出的“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或个体独自经历不公平中都有可能存在(歧视归因)”,但由于群体成员身份的作用,群体共同经历条件下有可能产生比个体经历条件下更强烈的歧视归因。鉴于“歧视归因”这一内容只是对以往研究结果的陈述,并非我们的关键论点,所以我们在修改稿中并未对其做进一步论述。

意见5:研究1、3都是女性被试为主体,应讨论性别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影响。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的确，实验 1 和实验 3 均以女性被试为主体，为检验性别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我们纳入性别因素对所有三项实验(包括实验 2)中的主要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实验 1 和实验 2 中，性别主效应及其与实验条件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实验条件主效应及事后两两比较的结果并未发生改变。在实验 3 中，性别主效应不显著，实验条件主效应显著，性别与实验条件之间交互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实验中性别与实验条件之间交互作用主要是由于：在朋友共同经历组和独自经历组中男女在不公平感知上均无显著性差异，但在陌生人共同经历组中则存在性别差异。三项实验纳入性别后的分析结果如下：

(1)实验 1 纳入性别因素进行分析后的结果：

采用 3(实验条件：群体共同经历、个体共同经历、独自经历) × 2(性别：男、女)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主效应不显著， $F(1, 145) = 0.03, p = .886$ 。实验条件主效应显著， $F(2, 145) = 3.20, p = .044, \eta^2 = .042$ 。实验条件和性别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145) = 0.01, p = .99$ 。对三种实验条件下的不公平感知分数进行进一步事后比较(LSD)，结果发现，群体共同经历条件下($M = 7.04, SD = 1.19$)和个体共同经历条件下($M = 7.09, SD = 1.22$)的不公平感知分数显著低于独自经历条件($M = 7.69, SD = 1.07$)， $ps < .05$ 。两种共同经历条件下的不公平感知分数无显著性差异($p = .88$)。

(2) 实验 2 纳入性别因素进行分析后的结果：

采用 2(实验条件：群体共同经历、独自经历) × 2(性别：男、女)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主效应不显著， $F(1, 123) = 0.08, p = .777$ 。实验条件和性别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123) = 0.92, p = .339$ 。实验条件主效应显著， $F(1, 123) = 7.34, p = .008, \eta^2 = .056$ 。群体共同经历组的不公平感知得分($M = 7.47, SD = 1.15$)显著低于独自经历不公平组($M = 8.00, SD = 0.93$)。

(3)实验 3 纳入性别因素进行分析后的结果：

采用 3(实验条件：朋友共同经历、陌生人共同经历、独自经历) × 2(性别：男、女)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主效应不显著， $F(1, 156) = 3.09, p = .081$ 。实验条件和性别交互作用显著， $F(2, 156) = 6.03, p = .003, \eta^2 = .072$ 。实验条件主效应显著， $F(2, 156) = 6.18, p = .003, \eta^2 = .073$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陌生人共同经历组中，男性的不公平感知评分($M = 5.96, SD = 2.23$)显著低于女性($M = 7.39, SD = 1.08$)， $F(1, 156) = 10.28, p = .002, \eta^2 = .062$ ；在朋友共同经历组($M_{男} = 7.42, SD = 1.18; M_{女} = 6.87, SD = 1.16$)和独自经历组($M_{男} = 7.50, SD = 1.24; M_{女} = 7.78, SD = 0.89$)，男性被试和女性被试的不公平感知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F_{朋友共同经历}(1, 156) = 2.39, p = .124, \eta^2 = .015; F_{独自经历}(1, 156) = 0.71, p = .402, \eta^2 = .004$)。

总体而言，实验 1 和实验 2 的结果均表明，性别因素并未影响实验结果。至于实验 3 中性别和实验条件产生交互作用，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该实验中“陌生人共同经历组”中男性被试数量少于 10 人(见表 1 中标红部分)，从而导致了实验结果的偏差。三项实验中每种实验条件下男女被试频数见下表 1。

表 1. 实验 1~3 中男女被试人数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群体共同	个体共同	独自	群体共同	独自	朋友共同	陌生人共同	独自
男	14(26%)	17(33%)	10(22%)	35(58%)	33(42%)	15(28%)	8(15%)	18(33%)
女	39(74%)	35(67%)	36(78%)	25(49%)	34(51%)	38(72%)	46(85%)	37(67%)

鉴于性别因素不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因素,在理论框架和文献综述部分并没有回顾该类文献,在正文中将其作为固定因素纳入分析会导致实验结果显得冗余,因此我们没有将上述分析结果写入正文中。如果专家觉得有必要,我们也可将上述结果的分析放在附录部分供读者参考。

此外,我们在修改稿中,(1)分析了三项实验中每一种实验条件下的男女性别比例,结果表明,每种实验条件下男女性别比例均无显著性差异(见修改稿“2.2.2 不公平感知及拒绝率”、“3.2.2 不公平感知及拒绝率”和“4.2.2 不公平感知及拒绝率”红色字体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性别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2)根据专家建议,我们在文章讨论部分对被试取样的性别问题进行了阐述,具体增加的语句如下(见修改稿“5 综合讨论”最后一段):

虽然三项实验中每一种实验条件下男女被试的比例无显著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性别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然而,由于本研究是随机招募被试,在实验 1 和实验 3 中存在总体性别失衡的现象,即整个实验中女性被试明显多于男性被试,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验结果的可推广性。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三项实验中参与者(如独自经历条件中的分钱者和接受者,共同经历条件中的分钱者、被试及另一名共同经历者)的性别是随机匹配的。由于样本量的限制,本研究无法分析不同类型的性别匹配模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在更好地平衡性别因素,或控制参与者性别匹配模式的条件下对本研究结果进行检验。

意见 6: 研究 1.2.3 中的拒绝率均无显著差异(研究 1 也只是边缘显著),因此在讨论中不能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体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在综合讨论部分提到“三项实验虽然在不公平感知上获得了非常一致的结果,然而在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上的结果则不稳定。”这样的说法并不合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结果是稳定的,稳定的不存在显著差异。

回应: 感谢专家意见。专家指出的,实验 1 中在拒绝率上呈现“边缘显著”的结果应该是“个体共同经历”与“独自经历”两种条件下的差异。事实上,“群体共同经历”与“独自经历”在拒绝率上是显著的,原稿表述如下(另见修改稿“2.2.2 不公平感知及拒绝率”部分):

对三种实验条件下的拒绝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三种条件下的拒绝率差异显著, $F(2, 148) = 4.20, p = .017, \eta^2 = .054$ 。事后比较(LSD)发现,群体共同经历条件下的拒绝率($M = 0.52, SD = 0.35$)显著低于独自经历条件下的拒绝率($M = 0.71, SD = 0.29$), $p = .004$;个体共同经历条件下的拒绝率($M = 0.59, SD = 0.34$)也低于独自经历条件,统计结果边缘显著, $p = .082$;两种共同经历条件下的拒绝率无显著差异($p = .25$)。

不过,正如专家指出的,鉴于实验 2~3 中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和独自经历不公平条件下的拒绝率均无显著性差异,我们在讨论中的语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体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欠妥。为此,我们删除了该表述。此外,经专家提醒,我们梳理了全文,删除及修改了其他相关表述。具体如下:

(1)删除“摘要”中的语句:“同时,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试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

(2)将原稿“3.3 讨论”部分的语句:“实验 2 的结果表明,即使在“轮流决策”条件下,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相比独自经历不公平,同样降低了被试的不公平感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体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研究结果支持假设 1,而不支持假设 2。换言之,群体共同经历条件下依然未出现不公平感知的“反转”。”

修改为:“实验 2 的结果表明,即使在“轮流决策”条件下,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相比独自经历不公平,同样降低了被试的不公平感知。上述结果表明,群体共同经历条件下依然未出现不公平感知的“反转”。此外,两种条件下被试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无显著性差

异。”

(3)将原稿“4.3 讨论”部分的语句：“本实验结果表明：首先，两种群体共同经历(“朋友共同经历”和“陌生人共同经历”)不公平条件下，相比个体独自经历不公平，降低了个体的不公平感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体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

修改为：“此外，同实验 2，两种群体共同经历与独自经历条件下，被试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无显著性差异。”

意见 7：共同经历为何降低不公平感知？作者虽然提及到“内群体参照”，但阐述不充分，需要结合相关理论进行更深入阐述。

回应：感谢专家意见。我们在修改稿中增加了“内群体参照”相关的论述，如下(见修改稿“1.2.1 群体共同经历、社会比较与不公平感知”部分第 3、4 段)：

以往研究考察了群体成员身份对个体社会比较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内群体参照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Brown et al., 1992; Leach & Vliek, 2008; Major et al., 1993; Smith & Leach, 2004)。毕竟，只有当两件事情属于同一个类别或群体时，它们才具备可比性(Allport, 1940; Sherif & Hovland, 1961)。Smith 和 Leach(2004)通过日记法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比较，结果发现，少数民族的学生更倾向于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学生进行社会比较。Major 等人(1993)通过最简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操纵群体成员身份，随后将被试暴露于成功的(或不成功的)内群体(或外群体)成员。结果表明，暴露于成功的内群体成员时，被试报告了更低的自尊以及更消极的情绪。

当个体与他人以群体身份共同经历不公平时，个体可能会将自身遭遇与同一群体中具有相似经历的他人(共同经历者)进行社会比较。由于内群体成员之间的比较是平行比较(自身遭遇不公平，他人也遭遇不公平)，据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测：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相比独自经历不公平，会降低个体的不公平感知(假设 1)。然而，群体成员身份还有可能朝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影响共同经历条件下的不公平感知。

.....

审稿人 2 意见：

该研究采用三人最后通牒博弈任务，通过三项系列实验检验了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如何影响个体的不公平感知。结果发现，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显著降低被试的不公平感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公平方案的拒绝率。研究选题前沿，程序规范，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意见 1：引言部分提到“Boothby 等人(2014)发现共同经历是的不可口的巧克力被判定为更不可口，进而推论共同经历增强了个体的感知”，是否可以推测：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共同经历应该增强而非削弱不公平感知？

回应：感谢专家意见。Boothby 等人(2014)的研究表明，共同经历会增强个体的感知觉体验。该研究结果与本研究假设 2(群体共同经历会增强个体的不公平感知)，从直觉上来说，确实存在互相呼应的关系。然而，由于该研究关注的是“感知觉体验”，且不涉及群体成员身份，而本研究则关注的是“群体共同经历”如何影响“不公平感知”，因此我们并未基于该研究来推出我们的假设，而是基于更直接相关的领域，即群体成员身份及公平领域的研究来推出本研究假设。

意见 2：部分中关于两个竞争性假设的描述尚不清晰，逻辑有些混乱，建议重新梳理下。尤其是，群体身份与不公平感知之间关系的文献梳理不够，有部分研究(Mendoza et al., 2014; McLeish & Oxoby, 2011; Wu & Gao, 2018)表明人们更倾向于拒绝内群体成员的不公平方案，

表现出“黑羊效应”。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原稿中关于两个竞争性假设的描述确实不够清晰，为此我们重新梳理了这两部分的逻辑：(1)在假设 1 提出的过程中增加了关于“内群体参照”的文献，并进一步阐述了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为什么可能会由于参照点的改变，进而导致个体不公平感知的降低；(2)关于专家特别指出的，存在“黑羊效应”(人们更加难以容忍内群体成员的不公平行为)的相关研究；事实上，我们先前已经关注到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在原稿中并未介绍这方面的研究，并非由于疏忽，而是由于此部分内容旨在论述存在一种与假设 1 相反的可能性，即“群体成员身份可能会增强个体的不公平感知”。经专家提醒，我们觉得完全不提及这一方面的文献确实欠妥，为此我们在修改稿中增加了相关内容，并进一步完善了假设 2 的提出逻辑。

更具体的，假设 1 提出过程中新增及修改后的内容如下(见修改稿“1.2.1 群体共同经历、社会比较与不公平感知”部分第 3、4 段)：

沈林林等人(2020)考察的是未涉及群体成员身份的共同经历，那么当涉及群体成员身份，即当个体与他人以群体身份共同经历不公平时，“参照点改变”的观点是否仍然适用呢？以往研究考察了群体成员身份对个体社会比较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内群体参照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Brown et al., 1992; Leach & Vliek, 2008; Major et al., 1993; Smith & Leach, 2004)。毕竟，只有当两件事情属于同一个类别或群体时，它们才具备可比性(Allport, 1940; Sherif & Hovland, 1961)。Smith 和 Leach(2004)通过日记法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比较，结果发现，少数民族的学生更倾向于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学生进行社会比较。Major 等人(1993)通过最简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操纵群体成员身份，随后将被试暴露于成功的(或不成功的)内群体(或外群体)成员。结果表明，暴露于成功的内群体成员时，被试报告了更低的自尊以及更消极的情绪。

当个体与他人以群体身份共同经历不公平时，个体可能会将自身遭遇与同一群体中具有相似经历的他人(共同经历者)进行社会比较。由于内群体成员之间的比较是平行比较(自身遭遇不公平，他人也遭遇不公平)，据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测：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相比独自经历不公平，会降低个体的不公平感知(假设 1)。然而，群体成员身份还有可能朝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影响共同经历条件下的不公平感知。

假设 2 提出过程中新增及修改后的内容如下(见修改稿“1.2.2 群体成员身份与不公平感知”部分第 3、4 段)：

当然，基于双人最后通牒博弈任务的另一些研究也发现了相反的结果，即为了维护公平的规范，人们更倾向于惩罚内群体成员的不公平行为，表现出“黑羊效应(black sheep effect)”(McLeish & Oxoby, 2011; Mendoza et al., 2014; Wu & Gao, 2018; 张振等, 2020)。然而，关于第三方惩罚(或称为利他性惩罚)的研究则相对一致地表明，人们更加难以容忍外群体成员对内群体成员实施的不公平行为。例如，Bernhard 等人(2006)以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当地的两个部落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当内群体成员遭受外群体成员的不公平对待时(相比外群体成员遭受外群体成员的不公平对待，以及外群体成员遭受内群体成员的不公平对待)，两个部落中的居民都对不公平实施者施以更严厉的惩罚。Goette 等人(2006)以在一起进行为期四周集训的部队军官为研究对象，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即当自己所在排的军官受到另一个排的军官不公平对待时，被试对不公平实施者施加了更严厉的惩罚。Schiller 等人(2014)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不公平实施者无群体身份，当不公平实施者为外群体成员时，人们会实施更严厉的惩罚，而当不公平实施者是内群体成员时，人们会实施更少的惩罚。

总体而言，无论是关于双人最后通牒博弈的研究还是第三方惩罚的研究，其结果均表明，群体成员身份会影响个体的不公平感知与行为。尽管有部分基于双人博弈任务的研究表明，人们对内群体成员实施的不公平行为更加难以容忍，但其他研究，包括双人博弈任务以及第

三方惩罚的研究，则表明人们会对外群体成员实施的不公平行为产生更强烈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具体到本研究中，当个体与他人以群体身份共同经历不公平时，个体可能将不公平实施者视作外群体成员(毕竟，内/外群体是相对而言的)。根据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Turner et al., 1987)，人们会根据一些线索，甚至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线索，自动地将自己和他人划分为内群体或外群体。一旦个体将自身与共同经历者视作内群体成员，而将不公平实施者视作外群体成员，基于以往研究，我们似乎可以推论出一种可能，即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相比个体独自经历不公平，会提升个体的不公平感知(假设 2)。

意见 3：三个实验中共同经历条件下参与者的性别如何匹配，仅同性别作为一组来参与实验？

回应：感谢专家的问题。三项实验中共同经历，以及独自经历条件下参与者的性别均是随机匹配的。专家可能会顾虑这种随机匹配会影响实验结果。事实上，我们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在独自经历条件下存在四种性别匹配模式，而对应的共同经历条件下则存在 8 种性别匹配模式，如下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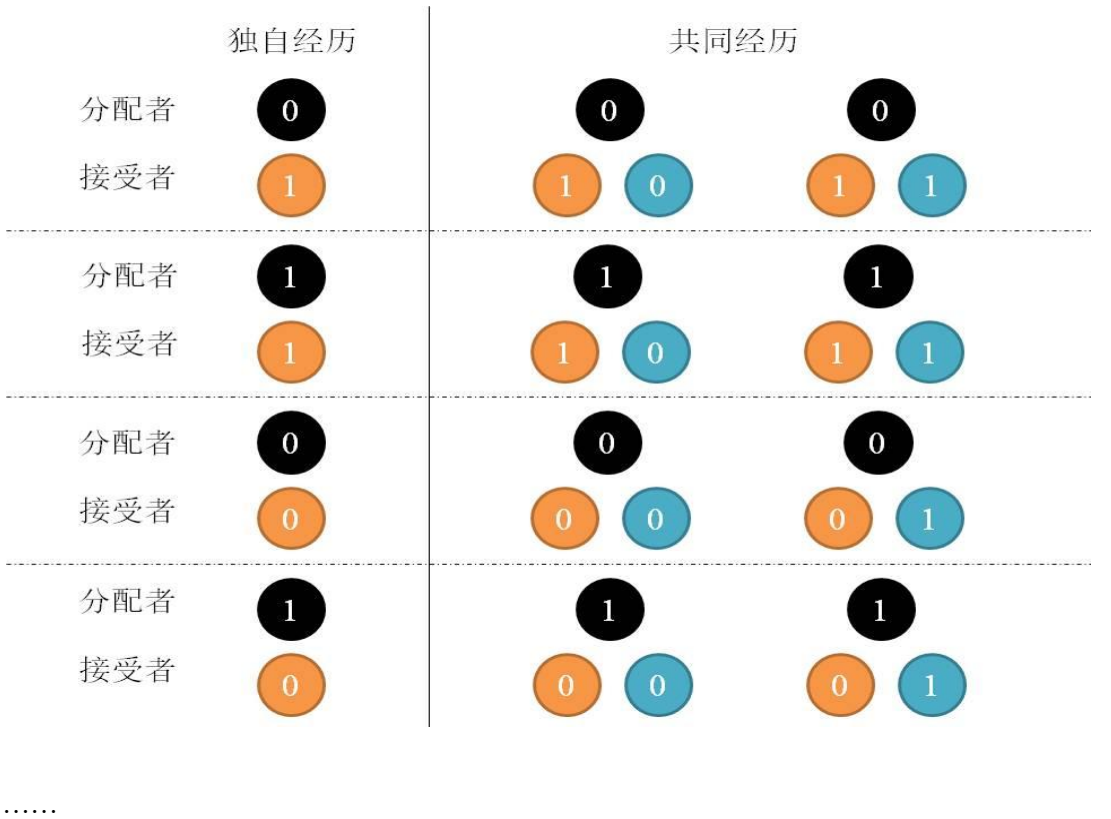


图 1 独自经历(4 种)及共同经历(8 种)条件下的性别匹配模式。黑色圆圈代表分配者，橙色和蓝色圆圈分别代表接受者(橙色代表被试，蓝色代表共同经历者)。圆圈中的 1 和 0 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

以目前的被试量，我们无法在保证足够 power 的情况下分析每一种模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三项实验中，如果将被试分配到每种性别匹配模式中，那么每种模式下不足 10 人)。尽管如此，我们分析了三项实验中每种实验条件下的性别比例，结果表明，每项实验中不同实验条件下(如群体共同经历 vs. 独自经历)被试的性别比例均无显著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排除了性别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相关分析结果及修改稿中增加的语句如下(详见修改稿“2.2.2 不公平感知及拒绝率”、“3.2.2 不公平感知及拒绝率”、“4.2.2 不公平感知及拒

绝率”部分):

实验 1:

此外,卡方分析表明,三种实验条件下男女性别比例无显著性差异, $\chi^2(2, N = 151) = 1.50, p = .472$; 故后续分析不再考虑性别因素。

实验 2:

卡方分析表明,两种实验条件下男女性别比例无显著性差异, $\chi^2(1, N = 127) = 1.05, p = .306$; 故后续分析不再考虑性别因素。

实验 3:

卡方分析表明,三种实验条件下男女性别比例无显著性差异, $\chi^2(2, N = 162) = 5.0, p = .082$; 故后续分析不再考虑性别因素。

此外,我们在修改稿中讨论了性别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如下(见“5 综合讨论”部分最后一段):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三项实验中参与者(如独自经历条件中的分钱者和接受者,共同经历条件中的分钱者、被试及另一名共同经历者)的性别是随机匹配的。由于样本量的限制,本研究无法分析不同类型的性别匹配模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在更好地平衡性别因素,或控制参与者性别匹配模式的条件下对本研究结果进行检验。

意见 4: 实验一中“共同经历”的变量操作存在一些问题,供作者思考。第一,从图 1 来看,两者是共享一套实验流程?那么提议者加红色边框,两个接收者均无边框,这种操作是否恰当,有助于区别两者吗?第二,“个体共同经历”和“群体共同经历”除了双方分享小组身份外,如何控制其他差异的影响。例如,两名接受者决策之间的影响和责任性。个体共同经历条件下被试接受则提议按此分配,那如果另一接受者也选择接受或拒绝是否导致不同结果。与之对比,群体共同经历下必须两者都选择接受则提议按此分配,若一方拒绝则群体均什么也得不到。从变量操作上来看,两种条件下被试的彼此影响及相应的责任性并不等同,如何看待这种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回应: 感谢专家的意见。首先,实验 1 中两种共同经历条件下,被试共享一套实验流程。在实验过程中,“提议者加红色边框,两个接收者均无边框”只是为了帮助被试区分“分钱者”和“接受者”角色,而不是为了区分两种共同经历。其次,针对专家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并非仅仅通过共享“小组”身份来操纵群体身份,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操纵“共同命运”(也即专家所指的“责任性”)来操纵群体身份,进而区分“群体共同经历”和“个体共同经历”。具体而言,在群体共同经历条件下,被试的决定不仅影响到自己,还会影响到自己小组的另一他人(如果自己拒绝,那么共同经历者也会一无所获)。我们正是有意识地通过操纵这种“责任性”(共同命运)来操纵群体成员身份。以往研究表明,共同命运范式能有效地操纵和凸显群体身份(Charness et al., 2007; Sutter, 2009; Wang, et al, 2018)。为了更清楚地表述上述观点,我们在修改稿中增加了如下语句(详见修改稿“1.2.2 群体成员身份与不公平感知”第 4 段):

总体而言,我们不仅通过共享“小组”身份,而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共同命运”来操纵群体成员身份,进而区分“群体共同经历”与“个体共同经历”两种实验条件。

意见 5: 前沿提及沈林林等(2020)提出的“参照点改变”观点和社会比较,请问决策后公平感知的测评是如何考虑的?该测量中的参照点是谁,提议者或另一名接受者?

回应: 感谢专家的问题。因本研究旨在考察社会情境因素——群体共同经历——如何影响个体的不公平感知,因此我们并没有直接要求被试将自己的收益与“分钱者”或“另一名接受者”的收益进行比较,而是让被试评估提议者的分配对自己是否公平(“您觉得分钱任务中分钱者给您分配的钱数公平吗?”)。我们假定,在此过程中,被试会自动化地参照他人(独自经历

时的分配者,共同经历时的提议者和共同经历者)的收益进行公平感的评估(两种条件下可能存在不同的参照点)。如果直接要求被试参照“共同经历者”或“提议者”的收益来进行公平判断,可能存在诱导被试的情况。我们在修改稿中对此做了进一步说明,如下(详见修改稿“5 综合讨论”部分第3段):

需要指出的是,与沈林林等人(2020)实验操作一致,在公平感知判断的过程中,本研究并未直接或外显地要求被试将自身收益与分配者,亦或共同经历者进行比较。因此,上述社会比较过程是一种自动化的、自发产生的过程(e.g., Wolff et al., 2020)。与此相应的,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群体成员身份可能是作为一种“框架(frame)”,在不经意间影响了个体的人际比较过程(Leach & Smith, 2006; Leach & Vliek, 2008; Stapel & Blanton, 2004)。

意见 6: 作者认为群体共同经历条件下的责任分散或共同命运操作不足导致了两种共同命运条件间的阴性结果,那么为何实验 1 和 2 不对群体身份变量进行操纵检验?同时,从拒绝率视角来看群体共同经历中被试的责任是分散的,即一方拒绝则所有人均得不到;但是从接受率视角来看群体共同经历中被试的责任则是强化的,只有两者均接受后才会导致提议在三者之间分配。因此,责任分散的解释似乎行不通。

回应: 感谢专家意见。首先,我们承认实验 1 和实验 2 确实存在不足。这两项研究均未对群体身份进行操作性检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进一步开展了实验 3,并在该实验中对群体身份进行操作性检验。此外,实验 3 中关于群体身份的结果也为实验 1~2 中群体身份操纵的有效性提供了间接支持。关于上述两点,我们在原稿中也做了说明(另见修改稿“3.3 讨论”部分,以及“5 综合讨论”第 5 段):

此外,鉴于前述实验并未对群体身份进行操作性检验,本实验 3 拟对两种共同经历条件下(“陌生人群体共同经历”和“朋友群体共同经历”)的群体成员身份认同进行测量。

本研究实验 3 通过对朋友群体和陌生人群体的“群体认同”程度进行测量,结果表明,两种实验条件下被试的“群体认同”评分均显著高于量表均值($p < .001$)。这一结果意味着,两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均产生了群体认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实验 1 和实验 2 并未测量被试的群体认同,但实验 3 中的“陌生人群体”与实验 1 和实验 2 中的群体操纵大体一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实验 1 和 2 对群体身份操纵的有效性)。

最后,我们同意专家的观点,即采用“责任分散”这一说法欠妥。为此,我们重新梳理了相关表述,修改后的内容如下(见修改稿“2.3 讨论”部分):

毕竟,在每一轮分配中,被试及共同经历者均需做出决定,因而每一轮的分配结果是由被试和共同经历者所共同决定的,而非由被试独自一人所决定。换言之,被试的决策只“部分”地影响到“团队”的结果。该操作可能会影响被试对群体成员身份的感知,即在实验过程中未能真正感受到自己与共同经历者是一个整体。鉴于此,实验 2 拟在“共同命运”操纵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轮流为群体决策”来加强群体成员身份;此时,个体需要“独自”为“整个团队的结果”负责,因而有利于让被试感知自己与共同经历者是一个整体,进而凸显群体成员身份。

意见 7: 实验 2 和 3 仅考察群体共同经历,而剔除个体共同经历条件,这种操纵令人不解。本文目的是从个体共同经历延伸至群体共同经历,为什么却删掉最核心重要,且实验 1 尚未检验清楚的环节呢?

回应: 感谢专家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在实验 2 和 3 中未继续考察个体共同经历条件,主要出于如下考虑:首先,以往研究(沈林林等, 2020)已经充分考察了“个体共同经历”相比“独自经历”对不公平感知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体共同经历会降低个体的不公平感知。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旨在考察群体共同经历,相比独自经历,是会同样降低个体的不公平感知,

还是会导致结果的反转，即增强个体的不公平感知。鉴于上述研究目的，我们并不十分关注“个体共同经历”与“群体共同经历”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虽然这种比较也是有意义的，但并非我们的核心研究目的)。其次，鉴于实验 1 中也已经发现了个体共同经历和群体共同经历无显著性差异，因此实验 2 和实验 3 的重点在于考察“群体共同经历”相比“独自经历”是否会出现“反转”的结果，故并未继续将“个体共同经历”纳入比较。

意见 8：三个实验中被试决策后的反馈信息是如何操纵与控制的？

回应：感谢专家提醒。我们在原稿中并未清楚说明被试决策后的反馈信息是如何操纵的。事实上，为避免提供反馈结果会影响被试的不公平感知以及随后的决策，我们在实验过程中并不提供任何反馈，即在被试做出“接受”或“拒绝”的选择后直接进行公平感知及其他变量的测量(在实验的过程中被试也并未对此产生任何疑问)。在修改稿中，我们在实验 1 和实验 2 的“实验程序”部分增加了相关内容的表述，鉴于实验 3 在这一部分同实验 1 和 2，故在修改稿中未赘述。修改后的内容如下(分别见“2.1.2 实验程序”和“3.1.2 实验程序”最后一段)：

在每一轮分配方案呈现后，被试做出“接受”或“拒绝”的决定。为避免提供反馈结果影响被试的不公平感知以及随后的决策，我们在实验过程中并不提供任何有关决策结果的反馈，即在被试做出决策后直接进行公平感知的测量：“您觉得分钱任务中分钱者给您分配的钱数公平吗？”(1 表示非常不公平，9 表示非常公平)(沈林林等, 2020)。

同实验 1，实验前采集被试的照片并上传到计算机。在每一轮分配方案呈现后，被试做出“接受”或“拒绝”该轮分配方案的决定；同样，为避免提供反馈结果影响被试的不公平感知及随后的决策，实验过程中并不提供任何有关决策结果的反馈。随后，被试完成公平感知的测量。所有任务结束后，向被试解释实验目的，并支付实验报酬。

意见 9：讨论中“实验 2 的结果表明，即使在“轮流决策”条件下，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相比独自经历不公平，同样降低了被试的不公平感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体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一般无法从阴性结果中得出结论，最后一句表述不是很恰当。同时，三个系列实验中关键性结果大部分都是阴性结果，也极大地影响了实验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的确，实验 2 和实验 3 中，群体共同经历和独自经历两种实验条件下的拒绝率无显著性差异，故而原稿中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体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欠妥。为此，我们将该部分的语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体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修改为：“两种条件下被试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无显著性差异。”

此外，经专家提醒，我们梳理了全文，删除及修改了其他与此相关的不恰当表述，包括：

(1)删除“摘要”中的语句：“同时，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试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

(2)将原稿“4.3 讨论”部分的语句：“本实验结果表明：首先，两种群体共同经历(“朋友共同经历”和“陌生人共同经历”)不公平条件下，相比个体独自经历不公平，降低了个体的不公平感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体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

修改为：“此外，同实验 2，两种群体共同经历与独自经历条件下，被试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无显著性差异。”

(3)删除“5 综合讨论”第一段语句“研究结果一致表明，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相比独自经历不公平，均显著降低了个体的不公平感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体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中的“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体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

虽然在拒绝率上三项实验结果不尽一致，然而在不公平感知(本研究关注的最核心因变量)上，三项实验获得了非常一致且显著性的结果。

意见 10: 讨论部分对核心结果的讨论略显不足。

回应: 感谢专家的意见。我们在修改稿中对讨论部分进行了加强。(1)增加了关于本研究结果潜在机制的讨论, 如下(见修改稿“5 综合讨论”部分第 3 段):

虽然本研究并未直接考察群体共同经历过程中被试“参照点改变”的认知过程, 但沈林林等人(2020)的眼动实验(实验 3)的结果则为此提供了借鉴。该研究采用能够反映被试对不同信息关注程度的眼动指标, 如注视时间(dwell time)、注视次数(fixation count)以及眼跳次数(saccades), 来考察个体共同经历条件下的认知过程。结果发现, 在存在共同经历者的条件下, 被试不仅关注分配者的收益, 而且也非常关注“共同经历者”的收益。不仅如此, 统计分析表明, 个体对共同经历者收益的关注程度越高, 其不公平感知越低。上述结果支持“参照点改变”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 与沈林林等人(2020)实验操作一致, 在公平感知判断的过程中, 本研究并未直接或外显地要求被试将自身收益与分配者, 亦或共同经历者进行比较。因此, 上述社会比较过程是一种自动化的、自发产生的过程(e.g., Wolff et al., 2020)。与此相应的,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 群体成员身份可能是作为一种“框架(frame)”, 在不经意间影响了个体的人际比较过程(Leach & Smith, 2006; Leach & Vliek, 2008; Stapel & Blanton, 2004)。

(2)增加了对如下重要论点“那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呢? 我们认为,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群体共同经历条件下所产生的“内群体参照”(由于内群体成员之间的平行比较降低了不公平感知)抵消了或淹没了“群体成员身份”的效应, 从而导致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感知显著降低了, 而非提升了个体的不公平感知。”的进一步论证, 如下(见修改稿“5 综合讨论”部分第 5 段):

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 群体成员身份的作用有可能被其他因素所干扰或淹没(Stagnaro et al., 2018)。具体而言, Stagnaro 等人(2018)发现, 在独裁者博弈中被试表现出内群体偏好, 但在最后通牒博弈中这种内群体偏好则消失了。作者解释, 这是因为当被试考虑到对方有可能拒绝自己的不公平分配(该种情况只存在于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 而不存在于独裁者博弈任务中)时, 出于维护自我利益的考虑, 他们面对外群体成员时也不得不表现得相对公平。换言之, 对自我利益的关注掩盖了群体身份的作用。

(3)增加了对如下重要论点“可能正是由于这种“认知”和“行为”后果的不同, 导致了个体在与其他群体成员共同经历不公平时存在不公平感知和行为上的差异。”的进一步论证, 如下(见修改稿“5 综合讨论”部分第 6 段):

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儿童身上存在着对不公平分配的认知和行为的不一致(Smith et al., 2013)。具体而言, 该研究表明, 三岁儿童虽然懂得“应该(I Should)”与他人进行公平分配(已经具备公平观念), 但其实际的分享行为并非如此(“I Won't”)。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 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时个体的认知(例如不公平感知、歧视知觉)、情绪和行为(拒绝与惩罚)的分离现象。

(4)增加了性别因素可能对实验结果产生潜在影响的讨论, 如下(见修改稿“5 综合讨论”部分第 7 段):

虽然三项实验中每一种实验条件下男女被试的比例无显著性差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性别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然而, 由于本研究是随机招募被试, 在实验 1 和实验 3 中存在总体性别失衡的现象, 即整个实验中女性被试明显多于男性被试, 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验结果的可推广性。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 三项实验中参与者(如独自经历条件中的分钱者和接受者, 共同经历条件中的分钱者、被试及另一名共同经历者)的性别是随机匹配的。由于样本量的限制, 本研究无法分析不同类型的性别匹配模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在更好地平衡性别因素, 或控制参与者性别匹配模式的条件下对本研究结果进行检验。

意见 11：其他一些细节性错误：图 7 的纵坐标标尺应与图 4 和 10 一致；Wang, et al, 2018。
回应：感谢专家意见。我们已在修改稿中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并对整个文章进行了反复检查和梳理。

#本部分新增参考文献

- Bernhard, H., Fischbacher, U., & Fehr, E. (2006). Parochial altruism in humans. *Nature*, 442(7105), 912-915. doi: 10.1038/nature04981
- Goette, L., Huffman, D., & Meier, S. (2006). The impact of group membership on cooperation and norm enforcement: Evidence using random assignment to real social group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2), 212-216. doi: 10.1257/000282806777211658
- McLeish, K. N., & Oxoby, R. J. (2011).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the salience of social ident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2(1), 172-178. doi: 10.1016/j.joep.2010.11.003
- Mendoza, S. A., Lane, S. P., & Amodio, D. M. (2014). For members only: Ingroup punishment of fairness norm violations in the ultimatum gam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5(6), 662-670. doi: 10.1177/1948550614527115
- Schiller, B., Baumgartner, T., & Knoch, D. (2014). Intergroup bias in third-party punishment stems from both ingroup favoritism and outgroup discriminatio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5(3), 169-175. doi: 10.1016/j.evolhumbehav.2013.12.006
- Smith, C. E., Blake, P. R., & Harris, P. L. (2013). I should but I won't: Why young children endorse norms of fair sharing but do not follow them. *PloS one*, 8(3), e59510. doi: 10.1371/journal.pone.0059510
- Stagnaro, M. N., Dunham, Y., & Rand, D. G. (2018). Profit versus prejudic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9, 50-58. doi: 10.1177/1948550617699254
- Wolff, F., Helm, F., Junge, F., & Möller, J. (2020). Are dimensional comparisons performed unconsciously?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rnal/external frame of reference model using implicit self-concept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12(2), 397. doi: 10.1037/edu0000375
- Wu, Z., & Gao, X. (2018). Preschoolers' group bias in punishing selfishness in the Ultimatum Gam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66, 280-292. doi:10.1016/j.jecp.2017.08.015
- Zhang, Z., Qi, C.H., Wang, Y., Zhao, H., Wang, X.X., & Gao, X. L. (2020). In-group favoritism or the black sheep effect? Group bias of fairness norm enforcement during economic game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2), 329-339. doi: 10.3724/SP.J.1042.2020.00329
- [张振, 齐春辉, 王洋, 赵辉, 王小新, 高晓雷. (2020). 内群体偏爱或黑羊效应? 经济博弈中公平规范执行的群体偏见. *心理科学进展*, 28(2), 329-339. doi:10.3724/SP.J.1042.2020.00329]

其它修改：

在原稿引言中有一部分内容与本研究主旨不是特别相关，为此我们在修改稿中删除了这部分内容，如下(原稿“1.2.2 群体成员身份与不公平感知”部分第 1 段)：

其他研究表明，群体成员身份会影响个体情绪及决策。Smith(1993, 1999)在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fication)和情绪评估(appraisal of emotion)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群际情绪理论(intergroup emotion theory)，认为当个体将自身归属于某个群体时，其社会身份会被凸显，此时人们会站在群体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时所体验到的情绪与其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时所体验到的情绪不同。例如，研究者让被试分别评估作为个体和作为群体一员(如作为一名印第安纳大学的学生)时所体验到的骄傲、愉悦等情绪。结果表明，在凸显了群体身份时(作为一名印第安纳大学的学生)，个体所体验到情绪的一致性显著高于他们作为个体时所体验到情绪

的一致性(Seger et al., 2009; Smith et al., 2007)。

其他细节性修改见修改稿红色字体部分。

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修改稿很好地回答了一审时审稿人提出的意见，但存在以下细节问题需要作者进一步完善。

意见 1：中英文摘要的表述方式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回应：首先，感谢审稿专家对上一轮修改的肯定。对于中文摘要部分，我们进行了进一步凝练和梳理，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以往研究考察了不公平经历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及行为。然而，这些研究着重于考察个体“独自经历”不公平的现象，而尚未有研究考察，当个体与他人以群体身份共同经历不公平时，不公平经历对个体的影响。三项实验采用改编的三人最后通牒博弈任务考察“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如何影响个体的不公平感知。研究表明，无论是通过“共同命运”(实验 1)、轮流为群体做决策(实验 2)，还是招募成对朋友(实验 3)来操纵或凸显群体身份，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相比独自经历不公平，均显著降低(而非提升)了个体的不公平感知。研究结果对于社会及组织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关于英文摘要，我们邀请了专业的英语编辑公司(essaystar)对其进行了修改和润色，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A large body of research examined the effect of experiencing unfairness on an individual's unfairness perception. However, the literature primarily focuses on experiencing unfairnes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 dearth of research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coexperiencing unfairness with others exists.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 of coexperiencing unfairness with another group member on unfairness perception. Three experiments were designed to test two competing hypotheses. The first hypothesis derived from the “reference change” view, which posited that coexperiencing unfairness with other group members would decrease unfairness perception. The second hypothesis derived from group membership research, which posited that coexperiencing unfairness with other group members would increase unfairness perception.

In Experiment 1,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signed to one of three conditions, that is, the experiencing unfairness alone condition (the “alone condition”), coexperiencing unfairness with another individual condition (the “individual coexperience condition”), and the coexperiencing unfairness with another group member condition (the “group coexperience condition”). In the alone condition, the participant acting as the responder was allocated a small amount of money (e.g., RMB 2 out of RMB 10) by the proposer in a two-person ultimatum game. The participant was instructed to decide whether to accept or reject the allocation for her/himself. One proposer and two responders were involved in the two coexperience conditions, in which the two responders were allocated a small amount of money (e.g., each responder received RMB 2 out of RMB 12) by the proposer in a three-person ultimatum game. In other words, the two responders coexperienced unfairness. In contrast to the individual coexperience condition, in which the

participants were told to make a decision for themselves,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group coexperience condition were informed that the two responders formed a group and thus needed to make a decision (i.e., to accept or reject the allocation) for the group. Furthermore, payoff commonality was employed to enhance group membership. Specifically,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group coexperience condition were told that “if one of you rejects the allocation, then both of you and the proposer will obtain nothing in the trial.”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showed that coexperiencing unfairness with another group member decreased unfairness perception and the rejection rate for the unfair allocation compared with experiencing unfairness alone.

In Experiment 2, group membership was manipulated by asking the participants to make a decision for the group in turn. The results duplicated the findings on unfairness perception from Experiment 1.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the group coexperience condition decreased the rejection rate for the unfair allocation compared with the alone condition, but the results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Experiment 3, two group coexperience conditions (i.e., a group of strangers and a group of friends) were examine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in both group coexperience conditions reported a lower unfairness perception than those in the alone condition. Similar to Experiment 2, coexperiencing unfairness with either strangers or friends decreased the rejection rate for the unfair allocation, but the results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se results have certain implications for reducing individuals’ unfairness perception in social contexts.

意见 2：摘要中提出的“研究结果对群体和社会管理具有借鉴意义”，在讨论中要有所体现。

回应：感谢专家意见，我们在修改稿讨论部分增加了如下内容(见修改稿“5 综合讨论”最后一段)：

“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 季民第十六》中的这一警世名言，强调了公平公正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组织公平感也是管理心理学关心的重要问题(刘亚等，2003)。本研究结果表明，相比独自经历不公平，在群体中与他人共同经历不公平降低了个体的不公平感知。这一结果启示，在国家政策制定或组织管理中需优先考虑公平；在无法确保完全公平的条件下，从降低个体不公平感知的角度而言，需尽可能避免对某些个体或某类群体独自实施不公平政策。

意见 3：2.1.1 的第二自然段中有表述不准确的地方，“共同经历不公平分配条件下个体的不公平感知程度更低。换言之，共同经历不公平降低了个体的不公平感知。”

回应：感谢专家意见，我们在修改稿中对该语句进行了重新表述，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结果发现，即使在共同经历与独自经历两种条件下个体的客观金钱获益相等，个体在共同经历不公平条件下，相比独自经历不公平条件，不公平感知更低。换言之，共同经历不公平降低了个体的不公平感知。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作者对审稿意见作出比较充分的答复，但目前仍存在一个问题：三项系列实验在拒绝率上比较稳健地发现阴性结果，仅在作者所强调“不公平感知”上获得一致且显著的结果，导致存在主观报告与行为决策上的分离。同时，鉴于不公平感知也是“检验不公平分配操纵有效性”的唯一指标，那么将其作为本项研究关注的最核心因变量是否合适？

回应：首先感谢审稿专家对上一轮修改的肯定。针对专家指出的，将不公平感知既作为“检验不公平分配操纵有效性”的唯一指标，也将其作为本项研究关注的最核心因变量是否合适的问题，我们认为：

(1)将不公平感知既作为操作检验的指标，又作为因变量指标，两者本身并不矛盾，这是因为两者所服务的目的不同，所做比较的参照对象也不同。具体而言，当以不公平感知作为操作检验的指标时，目的在于比较“公平分配”和“不公平分配”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此时并不涉及我们关注的几种实验条件之间的比较；而在以其作为因变量指标时，目的在于比较不公平分配条件下(公平分配作为填充项)，几种实验条件(如“群体共同经历”和“独自经历”)之间，个体不公平感知是否存在差异。

(2)感谢专家提醒，事实上，我们忽视了以“拒绝率”(而不仅仅是 unfair perception)作为公平分配和不公平分配操作有效性检验的指标。为此，我们在修改稿中增加了这一部分内容。三项实验的结果均表明，被试在不公平分配条件下的拒绝率显著高于其在公平分配条件下的拒绝率，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不公平分配操纵的有效性。增加的具体内容如下(分别见修改稿“2.2.1 不公平分配操纵的有效性检验”、“3.2.1 不公平分配方案操纵的有效性检验”，以及“4.2.1 不公平分配及群体身份操纵的有效性检验”红色字体部分)：

不公平分配条件下的拒绝率($M = 0.60$; $SD = 0.34$)显著高于公平分配条件下的拒绝率($M = 0.05$, $SD = 0.16$), $t(150) = 17.70$, $p < .001$, Cohen's $d = 2.07$ 。

不公平分配条件下的拒绝率($M = 0.69$; $SD = 0.31$)显著高于公平分配条件下的拒绝率($M = 0.08$, $SD = 0.25$), $t(126) = 17.19$, $p < .001$, Cohen's $d = 2.27$ 。

不公平分配条件下的拒绝率($M = 0.62$; $SD = 0.32$)显著高于公平分配条件下的拒绝率($M = 0.02$, $SD = 0.07$), $t(161) = 23.85$, $p < .001$, Cohen's $d = 2.60$ 。

#本部分新增参考文献

- Allport, G. W. (1940). The psychologist's frame of refer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37, 1–28. doi: 10.1037/h0060064
- Baumgartner, T., Götze, L., Gügler, R., & Fehr, E. (2012). The mentalizing network orchestrates the impact of parochial altruism on social norm enforcement. *Human Brain Mapping*, 33(6), 1452–1469. doi: 10.1002/hbm.21298
- Blake, P. R., & McAuliffe, K. (2011). “I had so much it didn't seem fair”: Eight-year-olds reject two forms of inequity. *Cognition*, 120(2), 215–224. doi: 10.1016/j.cognition.2011.04.006
- Blake, P. R., McAuliffe, K., Corbit, J., Callaghan, T. C., Barry, O., Bowie, A., ... Warneken, F. (2015). The ontogeny of fairness in seven societies. *Nature*, 528(7581), 258–261. doi: 10.1038/nature15703
- Brown, J. D., Novick, D., Lord, K. A., & Richards, J. M. (1992). When Gulliver travels: Social context, psychological closeness, and self-appraisa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 717–727. doi: 10.1037/0022-3514.62.5.717
- Leach, C. W., & Smith, H. J. (2006). By whose standard? The affective implications of ethnic minorities' comparison to ethnic minority and majority refer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 747–760. doi: 10.1002/ejsp.315
- Leach, C. W., & Vliek, M. L. (2008). Group membership as a “Frame of Reference” for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1), 539–554. doi: 10.1111/j.1751-9004.2007.00058.x
- Major, B., Sciaccitano, A. M., & Crocker, J. (1993). In-group versus out-group comparisons and self-estee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 711–721. doi: 10.1177/0146167293196006
- My, K. B., Lampach, N., Lefebvre, M., & Magnani, J. (2018). Effects of gain-loss frames on advantageous inequality aversion.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Science Association*, 4(2), 99–109. doi:

10.1007/s40881-018-0057-2

- Sherif, M., & Hovland, C. I. (1961). *Social judgment: Assimilation and contrast effects in communication and attitude chang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H. J., & Leach, C. W. (2004). Group membership and everyday social comparison experienc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4, 297–308. doi: 10.1002/ejsp.198
- Stapel, D. A., & Blanton, H. (2004). From seeing to being: Subliminal social comparisons affect implicit and explicit self-evalu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468–481. doi: 10.1037/0022-3514.87.4.468
- Turner, J. C., Hogg, M. A., Oakes, P. J., Reicher, S. D., & Wetherell, M. (1987).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Oxford, UK, Blackwell.
- Valenzuela, A., & Srivastava, J. (2012). Rol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situational salience in reducing intergroup bias: The case of ultimatum gam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8(12), 1671-1683. doi: 10.1177/0146167212458327
-

第三轮

编委意见:

同意审稿人意见, 建议接受。请在假设 1 和假设 2 开始处分别加上子标题(e.g., 1.2.1 假设 1:)。

回应: 根据编委专家的建议, 我们在假设 1 和假设 2 开始处加上了子标题, 修改后的内容如下(分别见修改稿“1.2.1 群体共同经历、社会比较与不公平感知”部分倒数第 1 段和“1.2.2 群体成员身份与不公平感知”部分倒数第 2 段):

由于内群体成员之间的比较是平行比较(自身遭遇不公平, 他人也遭遇不公平), 据此我们似乎可以做出假设 1: 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 相比独自经历不公平, 会降低个体的不公平感知。

一旦个体将自身与共同经历者视作内群体成员, 而将不公平实施者视作外群体成员, 基于以往研究, 我们似乎可以做出假设 2: 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 相比个体独自经历不公平, 会提升个体的不公平感知。

主编意见:

该文经过专家的几轮评审和作者的修改, 已经达到学报发表要求, 同意发表。